

# 王阳明文明书院讲学史实考辨

## ——以席书致王阳明系列书简为中心

刘恒武 陈名扬<sup>1</sup>

**【摘要】**：“贵阳讲学”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形成期，在阳明心学形成史上与“龙场悟道”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先学有关王阳明贵阳讲学的这一段史实语焉不详，且互有龃龉。《元山文选》所收席书致王阳明系列书简和《送别阳明王先生序》述及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的历史细节，这批文札可证：正德三年（1508年）夏至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这一时段内阳明曾一度应毛科之邀讲学于贵阳文明书院；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至同年十二月，阳明受席书邀请再度莅文明书院执教；文明书院是席书与王阳明相识相知的主要平台，两人在对“举业之学”的态度及《春秋》宗旨之理解等方面有颇多契合，在文明书院讲学期间王阳明还与席书就朱陆异同之辨、知行合一等论题进行了思想交流。

**【关键词】**：王阳明 文明书院 席书 系列书简

关于王阳明“贵阳讲学”的史实，明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sup>1</sup>、清刘原道编《阳明先生年谱》<sup>2</sup>、清陈澹然编《王文成公年记》<sup>3</sup>以及今人束景南的《王阳明年谱长编》<sup>4</sup>等著作均有述及，然而，诸书及相关论文均未对王阳明“贵阳讲学”的始末以及席王两人交往的细节做出清晰准确的勾勒。<sup>5</sup>

席书《元山文选》卷五“书札”收有席书致王阳明系列书札5通，其中4通以及同书卷一“序”所收席书《送别阳明王先生序》载有席书邀王阳明莅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以及当时二人交往的珍贵信息，有助于我们还原王阳明“贵阳讲学”的全部过程，窥知王、席两人的思想交集。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明四川遂宁县（今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弘治三年庚戌科（1490年）进士，历任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浙江按察司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南京兵部右侍郎等职，官至礼部尚书。《元山文选》是席书唯一传世文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年明刻本，计五卷，约十一万字，为海内孤本，近年，沈乃文主编的《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76册将《元山文选》收入其中，为我们深研席书致阳明书札提供了方便。

### 一、王阳明应毛科之邀首次执教于文明书院的经纬

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因弹劾权宦刘瑾获罪，王阳明上疏论救，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春，阳明至龙场，始悟“格物致知”。关于之后王阳明受聘贵阳书院讲学的经过，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悟‘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答而告以所悟。元山怀疑，去，明日复来。证之五经、诸子，渐觉有省。继是，往复数四，乃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sup>6</sup>

<sup>1</sup>作者简介：刘恒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陈名扬，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又，清刘原道《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先生主贵阳书院，身督诸生，师先生，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其说具《语录》中。”<sup>(7)</sup>另外，清陈澹然《王文成公年纪》载正德四年，“席公重先生，特葺书院，身率诸生，师事之。席公尝深慨陆氏之学不显，作《鸣冤录》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者。先生居贵阳二载，教化大行，民歌思之。后王杏以御史按贵州，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且有遥拜其家者。”<sup>(8)</sup>

然而，关于席书初识王阳明、贵阳文明书院设立以及阳明受聘讲学的细节，明清诸种阳明年谱载录不详，留有若干疑问。

按《元山文选》所收席书《与王阳明书（一）》原文：

书启：切惟执事文章气节，海内著闻，兹谪贵阳，人文有光，遐士大庆。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兹者，书以凡材，滥持学柄，虽边镇不比中州，而责任之重则一，兹欲再屈文旆，过我贵城，振扬吾道之光，用副下学之望。书尚不自主，商之二司，二司既同，白之三堂，三堂曰善。下至官僚父老，靡不共仰清尘，咸曰：“此吾贵城文明之日也。”馆舍既除，薰沐以俟，不知执事能一慨然否也？昔韩、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时，远谪二广。二广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庙食无穷。执事以文名时，以言遭贬，正与二公相类，安知他日贵人之思执事不如广人之思二公乎？即今省试已迫，愚意，欲候文车至止，处分就绪，乃议巡试之期。倘辱不以猥庸见拒，斯文幸甚！多士幸甚！外不腆之仪，奉以将敬，伏惟亮之。<sup>(9)</sup>

据《明武宗实录》，正德四年（1509年）正月，席书自河南按察司佥事升任贵州按察司提学副使<sup>(10)</sup>（故信中云“虽边镇不比中州”）。以上信函写于席书抵贵州任上之后，年月注记未录<sup>(11)</sup>。吟味信中语气，当为席书首次致书王阳明。

首先，关于席书结识王阳明的时间，据席书撰于贵阳的《与王阳明书（二）》云“书於执事，虽未承接下风，殆亦千里神会者”<sup>(12)</sup>，可知席书在抵贵之前与阳明并无过从，抵贵之后始与阳明会面。而束景南先生在《王阳明年谱长编》（后省称“束谱”）中称席书、阳明在京师时即已相识，此说有误。<sup>(13)</sup>不过，《与王阳明书（一）》开篇即为“文章气节，海内著闻”的赞语，说明席书对于阳明其人其文十分敬重。又，席书在写于正德四年（1509年）冬的《与刘用熙书（一）》中称，自己在未结识阳明之前对于阳明的认识是：“书近年获读王伯安之文，以为工於文者，仅以文士属之。”<sup>(14)</sup>

其次，关于文明书院的创设和王阳明初次莅院讲学的起止时间，这封书信云：“曩者，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后生咸失依仗。”信中“毛先生”“毛公”即席书的前任毛科，按《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毛科，字应奎<sup>(15)</sup>，余姚人，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第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sup>(16)</sup>据《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六年（1503年）四月，毛科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兼督理屯田。<sup>(17)</sup>又据明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弘治十七年（1504年）十月，毛科利用贵阳忠烈桥西胡指挥废宅并购置附近民宅新建文明书院，书院旁则建有提学分局，该地点为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教授何成琛所创文明书院旧址。<sup>(18)</sup>正德元年（1506年）七月，书院竣工，选有志者二百余人入院读书。正德四年（1509年）初，毛科与席书两人交接贵州按察司副使职事。

另，席书《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云：“今年董学贵南，阳明王伯安先生以言事谪丞龙场驿，延诸文明书院，以师后学。”<sup>(19)</sup>据此可知，上述席书信中提到的“书院”，即毛科创设的“文明书院”，亦是诸谱中言及的“贵阳书院”。

概言之，贵阳文明书院为元代何成琛初创，后由毛科在原址复建，并非毛、席共葺，更非席书“特葺”，钱德洪《王阳明年谱》与陈澹然《王文成公年纪》的记载均不准确。

关于王阳明首次主讲文明书院的情形，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多数研究者认为，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抵贵之后，毛科曾邀其至书院讲学，但被阳明婉拒。如束谱引阳明诗《答毛拙庵见招书院》<sup>(20)</sup>称正德三年阳明至龙场之后，毛科延请阳明至文明书院讲学，而阳明以卧病为由未赴，故“观诗所言，知阳明并未应招往文明书院”。<sup>(21)</sup>相关论文中，与束谱观点一致者甚众，

但亦有研究者撰文指出，阳明接受了毛科邀请首次至文明书院讲学。<sup>(22)</sup>

据《与王阳明书（一）》“应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执事，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一语可知，早在席书之前，阳明已应毛科之邀讲学于文明书院，而且业已培养了一批弟子。诚然，《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表明，王阳明最初以抱病就医为由推辞毛科之聘，然而，之后阳明入贵阳城中养病，一度被毛科接入家中休疗，并观毛科远俗亭，作《远俗亭记》<sup>(23)</sup>，阳明在贵城康复之后答毛科关照之情而俯教文明书院，这完全符合情理。毛科之所以邀阳明讲学，一方面是慕阳明之名，另一方面二人是余姚同乡，乡音共鸣。对于毛科之邀，阳明初以病相拒，终因情接受，并不违背逻辑。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阳明应毛科之邀第一次前往文明书院讲学的起讫时间。按钱谱，正德三年春，王阳明抵龙场驿，开设“龙冈书院”并讲学其中。龙冈书院讲学时期，阳明涉及讲学的诗歌有《龙冈新构》《诸生来》《诸生夜坐》《诸生》等。到龙场后不久，由于水土不服等缘故，阳明常患病。阳明《赠黄太守澍》云“卧病闭空院，忽来故人车”<sup>(24)</sup>，说明他曾卧病休养。阳明《却巫》云“卧病空山无药石”<sup>(25)</sup>，故《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云“野夫病卧成疏懒”“移居正拟投医肆”，这表明，阳明起先以卧病为由婉言谢绝了毛科的招请。因此，正德三年（1508年）春，龙冈书院初设再加上体况欠佳，阳明赴文明书院的可能性不大，最终“旅居书院俯教”应在入夏以后了。

据《与王阳明书（一）》“不意毛公偶去，执事遂还龙场”之语，阳明第一次辞去文明书院教席，是在毛科卸任之际。正德四年（1509年）元月，席书受敕继领毛科职务，然赴贵上任需耗相当时日。可以确定的是，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毛科致仕归浙，阳明与诸同僚于贵阳城南门外为之饯行，撰有《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sup>(26)</sup>阳明辞去文明书院教席，应与毛科去职归浙同步。

综上，阳明首次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的时间当在正德三年（1508年）夏至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之间的某一时段。

## 二、王阳明应席书之邀再度执教于文明书院的始末

王阳明收到席书第一通书札之后是如何回复的呢？阳明返信今已不存，但我们可以从席书《与王阳明书（二）》知其概略，是书亦见于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万历《黔记》卷三十九。席书《与王阳明书（二）》篇首云：

自入遐方，久不奉接君子之论。二生来过承，高明不以书不可与言，手赐翰教，亹亹千馀言。山城得此，不觉心目开霁，洒然一快。且又不以书不可与居，许过省城勉就。愚息闻之，踴扑莫知所为。窃惟古之固有风雨连床，心隔胡越者，亦有一面未交，诵其文想起人，而千里神会者。书於执事，虽未承接下风，殆亦千里神会者乎？<sup>(27)</sup>

由此可知，阳明收到席书来信后，迅即回信“千馀言”，并遣二弟子送到席书的手上，足见其对席书来信的重视程度。阳明信中内容，核心是“不以书不可与居，许过省城勉就”，亦即接受了席书的聘请。与其说，阳明对于此次文明书院的教席满怀期待，毋宁说是席书礼贤求师之心打动了阳明，同时阳明也有再到省垣为诸生讲学的愿望。席、王二人均有相识恨晚之感，故席书云：“虽未承接下风，殆亦千里神会者。”

《与王阳明书（二）》最后一段曰：

昨据二生云，执事将以即月二十三日强就贵城。窃谓时近圣诞，倘一入城，闭门不出，於礼不可，步趋於群众之中，於势不能。且书欲於二十六七小试诸生，毕，择可与进者十馀人，以待起居。可烦再踰旬日，候书遣人至彼，然后命驾何如？草遽多言，不及删次，惟情察，不宣。是月二十一日书再拜。<sup>(28)</sup>

知王阳明准备在得信当月二十三日即来贵阳，而席书则因接下来几天有事，恐不能安排妥当，希望阳明旬日之后入城。《与

王阳明书（二）》信末注曰“是月二十一日书再拜”，月份不详，关于此信撰写月份的考证，信中“圣诞”二字成为关键。束谱认为“圣诞”为孔子诞辰（即八月廿七），并从而认为此信作于八月。<sup>(29)</sup>然细细读之，席书前云“窃谓时近圣诞”，后云“且书欲於二十六七小试诸生”，旨在说明在这段时间内连续有事，故敬请阳明延迟莅临，因此“圣诞”之日与“二十六七”当不在同天。再者，龙场驿与文明书院相邻，明之龙场驿即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县治龙场镇，明代文明书院所在地即今贵阳市政府附近<sup>(30)</sup>，两地相距仅28公里，今日步行所需时间约六七小时，若云古代交通不便，最多也一日可至。<sup>(31)</sup>若“圣诞”为孔子诞辰（八月廿七），原计划二十三日就出发的阳明不会碰到“一入城，闭门不出”或“步趋於群众之中”的情况。鉴此，笔者认为，当时贵阳城准备庆祝的“圣诞”应为皇帝诞辰，亦即明武宗生日，据《明武宗实录》，明武宗生日亦即“万寿圣节”在九月二十四日<sup>(32)</sup>。由此可知，《与王阳明书（二）》作于九月二十一日，而王阳明原计划九月二十三日赴贵阳，这一天恰为武宗诞辰日的前一天。据此进一步推断，席书邀请阳明执教文明书院的《与王阳明书（一）》很可能亦作于九月，《与王阳明书（一）》→阳明复函→《与王阳明书（二）》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

以常理度之，王阳明大概接受了席书“再踰旬日”前往贵城的建议，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二十一日信发，旬日之后为这一年的闰九月初，此应即阳明再度执教文明书院的时间。席书《与王阳明书（三）》云：

《春王正月》稿，乃书戊午岁在淮时所为。昨听教及此，归阅遗稿，宛有暗合阳明之意。窃谓此千百年纷纷之疑，以书一得之愚，无戾高明。信乎古今天下，此心此理，本无二矣。始书私论《春秋》，颇有不信传而信经，不信人而信心。时无同志，尚虑或出意见，尤有不敢深自许者。兹幸有一得之中，愿终教也。闰九月十八日稿呈。<sup>(33)</sup>

该信撰于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十八日”，信中言及“昨听教及此，归阅遗稿”，可知席书闰九月十七日曾聆教于阳明，此时阳明已在文明书院开课授业了。

那么，此次阳明执教文明书院止于何时？事实上，这一时点即阳明离开贵州的时间。束谱引《宪章类编》，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诏阳明升庐陵知县，十二月离贵赴任。<sup>(34)</sup>依束谱的时序推之，闰九月诏出京师，驿传至贵阳，阳明接诏准备行旅，是年十二月踏上离贵旅程。

阳明诗《将归与诸生别于城南蔡氏楼》记叙了阳明收到擢升的诏令后，与文明书院诸生别于贵阳城南蔡氏楼的情形。<sup>(35)</sup>阳明在离贵赴赣途中所撰《与贵阳书院诸生书》云：“诸友皆不及相别。出城时，遇二三人于道傍，亦匆匆不暇详细”<sup>(36)</sup>，可知阳明离贵时较为仓促，不及一一道别。又从阳明《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二首》可知，当时有弟子送阳明至龙里县（今黔南州龙里县），其时情境“蹊路高低入乱山，诸贤相送愧间关”“雪满山城入暮天，归心别意两茫然”。<sup>(37)</sup>可知时在隆冬。又据阳明离贵后不久撰写的《舟中除夕》，其中有“扁舟除夕尚穷途，荆楚还怜俗未殊”“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sup>(38)</sup>，知是诗作于正德四年除夕，此时阳明已行抵湖南。以道里行程逆推，阳明离贵之日当在正德四年冬十二月，而非正德五年初，束谱为确。

总结以上分析，阳明再度执教文明书院应在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初至同年十二月这一时段。

### 三、王阳明在贵期间与席书的思想交流

王阳明对上述几封席书《与王阳明书》的复函虽已不存，但从席书信札内容可以看出，王阳明在贵期间与席书已有颇多思想交流<sup>(39)</sup>，具体表现在对于举业之学的看法、有关孔子作《春秋》之宗旨的认识、关于朱陆之别的见地等方面。

推测阳明在首封复函中言及“举业之学”，故席书在《与王阳明书（二）》中以大段篇幅谈论科举的利弊。<sup>(40)</sup>席书在信中直言“今举业之学，与古圣贤之学，诚不同科矣”，“举业之学”目的在于谋取科举考试的功名，所谓“夫举业者，利禄之媒也”，而“圣贤之学”在于为贤作圣为苍生社稷计。席书又指出，近来科举考试不过是命题作文，迎合主考之意，这实质上并非设立科举的初衷。不过，席书认为，举业本身具有两面性，“误天下之豪杰者，举业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举业也。”

因此，席书在信中表达了真诚期待，希望阳明先生“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从而使贵州士人“风动於道德仁义之域”。此信亦反映出担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对于提升贵州教育水平的热情与使命感。

虽然阳明论及“举业”的复函今已不存，但关于“圣贤之学”与“举业之学”的关系，阳明在《重刊〈文章轨范〉序》中有详细论述。<sup>(41)</sup>阳明居贵期间，受贵州监察御史王汝楫所请，为贵阳重刊之《文章轨范》撰序。根据这篇序文，王、席两人有关“举业”的认识若合符契，与席书在《与王阳明书（二）》提出的论见一致，阳明一方面在序中指出“圣贤之学”与“举业之学”差距“何啻千里”，另一方面也承认举业的现实必要性，认为倘若士子只有“圣贤之学”而无“举业之学”，圣贤之道便不能“大行于天下”。所谓“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这个“羔雉”需饰之以为礼，从而体现吾心之“诚”“敬”。

主讲文明书院期间，阳明曾作《春日花间偶集门生》一诗：“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sup>(42)</sup>一方面，“改课讲题非我事”一语直抒阳明对于授徒以举子业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则显示出阳明栽培生徒的严谨态度。

席书《与王阳明书（三）》提及，在听阳明讲解《春秋》后，发现自己先前对这方面的认识“暗合阳明之意”，大有妙契，认为“信乎古今天下，此心此理，本无二矣”，“颇有不信传而信经，不信人而信心”。<sup>(43)</sup>可以说，席书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内心极为喜悦。

据阳明《〈五经臆说〉序》<sup>(44)</sup>，阳明居龙场之时，常常坐在阳明洞中，默记抄写五经，计划将五经训释一遍。《〈五经臆说〉十三条》钱德洪序，称曾询阳明是书何在，阳明曰：“付秦火久矣。”<sup>(45)</sup>可知是书确实完成，然只得保存部分内容。又据《〈五经臆说〉序》，阳明自称其说“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故名“臆说”，知“亿说”为误。<sup>(46)</sup>

《〈五经臆说〉十三条》名曰“十三条”，实际只有十二条，其中前两条即阳明论《春秋》首篇“元年春王正月”。阳明认为“元年”为“人君正心之始”，认为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书“王正月”以明大一统。<sup>(47)</sup>除《〈五经臆说〉十三条》外，《王阳明集》还保存有《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内容与《〈五经臆说〉十三条》不同。席书在文明书院聆听的讲解或即此篇文章的要旨。此文主要批判了“世儒”对孔子作《春秋》的误解，“世儒”认为孔子撰写《春秋》使用鲁国年号而非周王年号，所谓“仲尼有圣德而无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己出矣，其得‘从周’乎？”“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sup>(48)</sup>然而，阳明认为：“周虽建子，而不改时与月，则固夏时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时云乎？”<sup>(49)</sup>况且《春秋》为“鲁国纪事之史”，孔子用鲁王年号并无不当之处。又论及所谓《春秋》行天子之事，阳明认为“《春秋》为天子之事者，谓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sup>(50)</sup>阳明认为《春秋》旨在明功罪、辨善恶，寓褒贬于事实。

《王阳明集》中《〈五经臆说〉序》《论“元年春王正月”》二文皆标注为“戊辰”即正德三年撰<sup>(51)</sup>，束谱认为阳明此文约撰于正德三年（1508年）冬尽之时，为“龙场悟道”之“始笔”。<sup>(52)</sup>鉴于当时阳明因于文明书院讲课，时常往还于龙场、贵阳之间，《五经臆说》中的文章当有一部分完成于初次执教文明书院期间，可能就包括《论“元年春王正月”》。因此，笔者认为，作为阳明心学形成关键期的“龙场悟道”必当包含有“贵阳讲学”期间的所思所悟。

再回到《与王阳明书（三）》，附着这封信一道呈给阳明的，是席书戊午年论《春秋》时所撰“《春王正月》稿”。合考《安定席氏族谱》及席书《有疾方面正官乞恩休致疏》，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席书升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管清江厂，督办漕船<sup>(53)</sup>；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年），改任户部山东司主事。<sup>(54)</sup>那么，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年），席书正于淮安府清江浦督办漕船，其《春王正月》之作即撰于此期。又，席书《送友人吴懋贞还抚州序》：“乃岁己未，予与芦泉刘用熙传《春秋》于淮浦。”<sup>(55)</sup>己未即弘治十二年（1499年），知席书在清江浦时与刘绩（字用熙，号芦泉）研习、探讨《春秋》之旨。

又按《元山文选》卷五“论”，存有席书六篇论《春秋》之作，分别为《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夹谷前》《夹谷后》《获麟前》《获麟后》，计七千余字，未见《春王正月》篇。然按诸篇内容，《孔子作〈春秋〉》一文似即席书信中所言《春

王正月》一文。(56)

席书在《孔子作〈春秋〉》中认为，“周盛时，是非大明于上，有邪必远，有恶必诛”，《春秋》不必作；而当“王室卑于列国”，“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是非不白”，则《春秋》作。《春秋》之作，孔子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心”知是非、辩邪正。<sup>(57)</sup>而天下人以《春秋》欲“假天子之柄”、“行天子之事”或“昭告天下之典为后世御制刑律之书”，皆误也。<sup>(58)</sup>在《〈春秋〉天子之事》一文中，席书再度重申，孔子作《春秋》并非“欲代天子之赏罚”，他认为“凡为史者，皆天子之事也”，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朱熹都是如此，不必专诬孔子，《春秋》的根本目的在于“彰善恶以垂天下之惩劝，辩是非以训天下之去取”。<sup>(59)</sup>可以说，席书与阳明对《春秋》宗旨的阐发是一致的。

《明史》载席书撰有《元山春秋论》<sup>(60)</sup>，说明席书对《春秋》钻研颇深，独立成书，而《元山文选》卷五“论”中只保存了其中部分精华内容。据《明代遂宁进士考》，在明代遂宁县30名进士中，有15名进士以《春秋》中式。<sup>(61)</sup>可知席书故乡遂宁县在明代时有大量士人研究《春秋》，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春秋学”热。而席书对《春秋》的研究当是明代四川“春秋学”的代表。

阳明执教贵阳文明书院期间，席书屡屡问学于阳明。席书在撰于正德四年（1509年）冬的《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有颇多记叙。该序着重叙述了席书向阳明问学一事，所谓“延诸文明书院”“日亲所学”。席书请教阳明，如何看待文章、事功，阳明以“君子儒”“小人儒”回答之。阳明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莫大者心，莫小者耳与目也”，文章为末而“心至大而至明”，君子宜“从其大者”“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如此，才能“蕴中为道德，发言为文章，措身为事业，大至参天地、赞化育而有馀矣”。

此外，朱陆异同也是席书向王阳明反复提起的论题。<sup>(62)</sup>根据钱谱记载，最初席书“问朱陆同异之辨”，王阳明不答而告以所悟“知行合一”之见。席书疑而不解，几经交流之后，乃悟“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sup>(63)</sup>在《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席书对于求教阳明的感悟做了这样的总结：阳明之学“直宗濂洛，上溯孔孟”“正而不迂，方而不泥，通而不俗，推万变而不一心，探幽赜而不远人事”，这便是阳明“学先於大”的良果。就濂洛以来学术传统而言，朱熹、陆九渊各分门户，“当时门人，互逞辨争，从陆者目为禅会，从朱者谓为支离”，造成了“道至是而一明，亦至是而一晦”的局面。<sup>(64)</sup>在这篇序文中席书亦流露出对朱明陆晦感到不平的态度。

正德十五年（1520年）暮春，席书辑陆九渊文章为《鸣冤录》，旨在鸣“陆氏之冤”，彰象山之学，后因“先达”认为“鸣冤”二字不妥，又易书名为《近取录》，旨在“近取诸身”而“破众惑”。<sup>(65)</sup>正德十六年（1521年）阳明撰《与席元山》，从该信可知，席书在这之前曾致函阳明，并附赠《鸣冤录》。阳明提及读完席书该辑的感想：“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馀子所及也。执事素能深信其学，此亦不可不察。”<sup>(66)</sup>据此可以窥知，与席书倾力标举陆学的态度不同，阳明对于陆学之思想内核持有自己的理性研判。

席书在收到阳明来信（即《与席元山》）后又致书阳明，此即《元山文选》所收席书第四封《与王阳明书》。书曰：“远承使者，走惠腆仪，再承来教，无任惊惕。书不揣愚昧，妄为陆氏鸣者，为今日诸君鸣也。执事昔在龙场，书怀此疑，尝以质之门下，曰：然。乃益信之。”<sup>(67)</sup>这封信提及席书在贵阳向阳明请教朱陆异同之事，可与钱谱相关记载相互印证，也表明席书对于陆学始终心怀执着。虽然王、席两人面对陆学的心态存在微妙差别，但在同年，阳明揭“致良知”之教，将陆九渊在江西的俊秀后裔送学肄业，并刻有象山集且序以表之。<sup>(68)</sup>可以说，阳明与席书二人在推播象山之学上步调一致。

总之，席书与莅贵讲学的王阳明会面后，对阳明道德学问的认识有一个较大转化。据席书正德四年（1509年）冬所撰《与刘用熙书（一）》，席书称其本人早在提学贵州之前便读过阳明之文，大加赞赏，但“仅以文士属之”；然在贵阳论学后，“扣其所蕴，道理尤精，盖尝于静中学他道而悟正学者”。<sup>(69)</sup>也就是说，席书在前两次致书阳明时，对阳明确实怀着真诚的问学求教的态度，但因未谋面谈，尚没有思想上的碰撞与交汇。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称：“时元山席公官贵阳，闻其言论，谓

为圣学复睹。”<sup>①</sup>自与阳明相见论学后，庆幸终于找到同道的席书开始理解吸纳阳明思想，两人一生的友谊也于此正式产生。

又，席书在《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认为“历代文运，必积百余年而后有大儒”，而“国家百四十年”来“未有妙契濂洛之传，足当太平文运之盛意者”，则是“有待於今”之阳明也。席书表达了与阳明“遭晤之晚”的遗憾，认为“君子不忧身之不遇，而忧道之无传”，虽不能日夜从阳明游，所谓“相从二三子於阳明山麓”，却“意气相感，已神会於浙海之隅矣”，愿共同“鞭励斯道”。<sup>②</sup>足见素来推崇象山之学的席书对阳明学问的钦佩、赞许，在文明书院共事的短暂数月中，席书以师礼事之，两人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同样，阳明亦十分珍惜与席书的情谊，在《与席元山》中，阳明表达了期待再次与席书当面论学的愿望，本欲借席书自福建升职北上之机两人于信州（今上饶）一会，特因此“驻信城者五日”，奈何错过，“怅快而去”，“恨无因一会”。<sup>③</sup>按《与席元山》内容，是信当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底七月初，阳明东归赴越省亲之际。在席书逝世后，阳明千里设位，遥奠席书，并撰《祭元山席尚书文》，追忆文明书院讲学时期与席书相知相识曰：“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sup>④</sup>文中赞扬席书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称其独具“卓然定见”，追求“身心之学”，可谓“心事磊磊”“超然远览”。又称席书“诚心乐善”“进贤于国”，反集怨谤。阳明对“知己”席书任礼部尚书期间屡次向皇帝举荐自己表达感激之情：“某之不肖，屡屡辱公过情之荐，自度终不能有济于时，而徒以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怀惭愧。”<sup>⑤</sup>足见阳明、席书二人深厚的师友情谊。

王阳明逝世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巡按御史王杏，“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sup>⑥</sup>。受阳明贵阳门人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所请，王杏赎贵阳白云庵旧址建王公祠，供贵人世代凭念，这也反映出阳明“龙场悟道”“贵阳讲学”在当地影响之深远。

## 结语

总结上文论述，明正德元年（1506年）毛科复建贵阳文明书院。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抵龙场驿。之后，受毛科之邀，于正德三年（1508年）夏至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之间的一个时段首次执教于文明书院。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初，阳明应席书之邀，再度执教文明书院，讲学终于同年十二月阳明离贵。席王二人因文明书院讲学事互通书札，阳明莅文明书院教席之后，两人又当面切磋学问，结下深厚情谊。两人对于“举业”的态度颇多共鸣，在《春秋》宗旨的阐发上基本一致；席书倾力举扬陆学，阳明虽对陆学存有独立的理解，但亦推之重之。在文明书院向诸生授业及与席书思想交流的过程中，阳明自身的学问体系也得到了延展与升华，西南黔、蜀也由此成为王学的派衍名区。因此，我们认为，“贵阳讲学”与“龙场悟道”密不可分，在阳明心学形成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注释：

1(6)(63)(68)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刊本，载《王阳明文献集成》第127册，广陵书社2019年版，第45~47、45、174~178页。

2(7)刘原道编：《阳明先生年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本，载《王阳明文献集成》第131册，广陵书社2019年版，第102页。

3(8)陈澹然编：《王文成公年谱》，清光绪刊本，载《王阳明文献集成》第131册，广陵书社2019年版，第152页。

4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6~477页；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27~544页。

---

5 论及王阳明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的代表论文有谭佛佑《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辨证》，《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王路平《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何静梧《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6期；王路平《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浙江学刊》1997年第6期；陆永胜《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焦堃《王阳明主教文明书院背景考述》，《王学研究》2018年第2辑；张明、管华香《王阳明与贵州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李承贵《论席书对阳明心学的特殊贡献》，《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等等。

6(12)(14)(19)(27)(28)(33)(40)(43)(57)(58)(59)(64)(65)(67)(69) 輯1) 席书：《元山文选》，载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76册，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497、497、501、349~350、497、499、499、497~499、499、465、466、467~469、349~351、361、499、501~502、350~351页。按：刻本中有席书与阳明书札五通，第一通篇名为《与王阳明书》，后四通皆以“又”字省题，本文为了明确书札顺序，附以数字编列。

7《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六，正德四年春正月辛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508页。

8根据《与王阳明书（二）》推测，《与王阳明书（一）》可能撰于正德四年（1509年）9月，详见下节。

9(29)(34)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29~530、529、539~543页。

10席书《与王阳明书（一）》作“应光”。

11《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二函，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12《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57页。

13徐节：《新建文明书院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据徐记，毛科开拓此地时发现《重修顺元路儒学记》断碑一通，知此地原为元代顺元路儒学故址，后儒学迁建，元皇庆年间（1312-1313）教授何成琛（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作“何成禄”）于该地创办文明书院，后废置不存，1504-1506年在毛科的主持下始得以重建。另参见金方隆《顺元路儒学：贵阳最早创设的学校》，《贵阳文史》2017年第3期。

14(23)(24)(25)(26)(35)(37)(38)(41)(42)(44)(45)(47)(48)(49)(50)(66) 輯0) 輯2) 輯3) 輯4) 輯5)（明）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23、757~758、621、623、739~740、915~916、916、632、741~742、631、742、830、830~831、775、777、776、162、1195、162、818、817~818、1123页。

15(52)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504页。

16与束谱观点一致的代表性论文有张明、管华香《王阳明与贵州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金生杨《论席书与王守仁的学术交流》，《王学研究》第11辑，2019年。认为阳明接受了毛科之邀赴文明书院讲学的论文有陆永胜《王阳明龙冈书院讲学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李承贵《论席书对阳明心学的特殊贡献》，《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7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文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

18 阳明在龙场驿时出门多骑行，如其《游来仙洞早发道中》诗云“冲星策晓骑”，《别友》云“凌晨驱马别”。参见《王阳明集》卷十九外集一，第 621 页。那么，龙场至贵阳即可达无疑。

19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正德十四年九月乙卯，第 3480 页。另外，张明亦认为席书信中“圣诞”即明武宗生日，详见张明、管华香《王阳明与贵州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 年第 6 期。

20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补编》附录一异文，第 256~257 页。

21 张宏敏等学者将席书归于“黔中王门”。参见张宏敏《黄馆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22 黄馆《阳明先生行状》亦云：“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一相契，独于晦庵注疏若相抵牾，恒往来于心，因著《五经臆说》。”参见《王阳明集》卷三十七附录六世德纪，第 1195 页。

23 《王阳明集》中对诗文时间的标注多不准确，如著名的《瘞旅文》，文章开始即注明“维正德四年秋月”，正德四年为己巳年，而文章标题后却标明“戊辰”（即正德三年）。见《王阳明集》卷二十五外集七，第 808 页。

24 《安定席氏族谱》卷一年谱，清道光五年（1825 年）遂宁刻本。《元山文选》卷三奏议，第 429 页。

25 《安定席氏族谱》卷一年谱。《族谱》载弘治十四年席书擢“户部山东司员外郎”，然据席书本人所上《有疾方面正官乞恩休致疏》，职务当为“户部山东司主事”。

26 席书：《元山文选》卷一序，第 348 页。刻本题为《送友人吴懋贤还抚州序》，按内容，吴懋贤当为吴懋贞。

27 另外，《元山文选》卷五“论”存目《天人一也》，正文中未见是文。

28 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六《志》第七十二《艺文》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363 页。

29 胡传淮、陈名扬：《明代遂宁进士考》，《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30 金生杨认为，席书对于阳明知行合一说，由疑而信，接受并践行之，与此同时，阳明也受到席书朱陆同异论的影响。参见金生杨《论席书与王守仁的学术交流》，《王学研究》2019 年第 11 辑。